

在中国古代社会 既有着丰富多彩的商业广告,也有着许多非商业性的“社会广告”。“社会广告”按照它所传播的信息内容,一般可以划分为政治广告、文化广告、军事广告这三大类型。其中文化广告主要承载着传播文化信息的功能,明清时期的楹联可以说是当时重要的文化广告形态之一。

中国古代一般将对联称为“楹联”或“楹帖”,因其要悬挂于建筑的门前双楹之上,毫无疑问具有广而告之的信息传播作用,并能起到较好的传播效果。明清时期对联广告流行,对联广告成为商业广告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如各行各业都有专属的行业广告对联。而除了商业性的广告对联以外,非商业性内容的对联,往往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传达了特定的社会信息,从这一角度而言,对联广告也是明清时代最为普遍的一种文化广告。有关商业领域的对联广告,不少广告史学者已有过许多论述,本文则主要从文化广告的角度谈一谈明清对联。

明清时代除了商业性的行业对联外,对联在整个社会的运用是非常普遍的,官员衙署、学院试场、名胜古迹、寺观庙宇、驿站会馆、百姓居第等等,几乎凡有人处必有对联

之迹。这些对联虽然有大量是平庸雷同的应景之作,但也有许多出色的对联不仅十分吻合所题写对象的属性与意境,而且其蕴意往往在对象之外,或者表达了作者立身处世的思想,或者倡导了世风民俗的改易,或者宣示了某种价值观念的取向,或者承诺了政治或道义上的责任,这些对联大都脍炙人口,在民间有非常高的传播度,堪称明清时代杰出的文化广告。下面就从明清时期不同场合的楹联看它所发挥的文化传播的作用。

一、书院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末顾宪成题东林书院的对联,可谓对联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副书院楹联。此联号召天下士子要发奋寒窗苦读,但也不能只做埋首故纸堆中的应试之士,还要时刻关注家国大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担当的重任。这副对联宣扬

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传统的中国古代读书人所持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但运用对联这一通俗易懂的形式将之概括提炼,并广泛传播,达成了深远的影响,几乎成为不同时代读书人的共同座右铭。此则对联可以视为文化广告的一个经典。虽然此联出自封建时代的士人之口,但



□ 张 剑

响是极为深远的。这些学生在回国后,在各个领域内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詹天佑,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铁路。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等都是留学幼童中的佼佼者。

第三是设立翻译馆,翻译外国文献。李鸿章深刻地意识到,学习西方文化就必须能够阅读西方书籍,这样就无需假借洋人之手,可以独立发展中国自己的学术。正是出于此种目的,李鸿章在1868年成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并且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和玛高温等人为翻译馆顾问,专门负责挑选“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译”。此间,江南制造翻译馆网罗了当时国内最为著名的一批翻译家,例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根据梁启超《西学目录》统计,1896年前出版的西学书籍总数在352种,其中30%左右是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出版的。梁启超对此项活动的评价是:“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3]由此可见,李鸿章所创立的翻译馆,对于近代教育、文化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

三、李鸿章教育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具有较为浓厚的封建主义。李鸿章的教育主张,总体上而言是以儒家“经世

致用”为主体的,和张之洞等人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思想危机,李鸿章希望调和新学和旧学之间的矛盾,中学和西学之间的矛盾,通过教育改良,拉拢新式知识分子,但是李鸿章又不能彻底摆脱封建主义信条,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充满了封建伦理思想,始终不承认西方在政治、伦理、经济等体制的优越性,而仅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军事技术上的差距。因此,李鸿章的教育思想带有强烈的片面性。在他对于留学生教育问题上,可以看到他思想中的封建性。李鸿章明确规定,学生在出洋之后,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不能够放弃中学的学习,小学生要学习《孝经》、五经、国朝律例等。不仅如此,“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4]。由此可见,李鸿章时刻不忘在新式教育中加入封建教育内容。

第二,偏向于技术教育。在李鸿章看来,只要大力发展军事技术,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清政府的统治就能够继续维持,因此在教育方面他过分偏重于军事技术教育,而其他专业几乎不涉及。即便是上海同文馆、天津电报学堂以及天津西医学堂等,在教育目

的上,也是为军事服务的。李鸿章在奏办上海同文馆的奏折中指出:“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不仅如此,在奏办天津电报学堂的奏折中,李鸿章再次指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5]由此可见,李鸿章从来就没有教育民用的想法,一切都是以维护清朝统治为出发点的。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其在近代教育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尝试,但是由于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李鸿章的教育思想中既有先进的一面,也有其落后的一面。深入研究李鸿章教育思想,对于理解洋务运动的兴衰,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田正平,杨云兰.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J].复旦教育论坛,2004(1).
 - [2]王希莲,张礼恒.李鸿章与中国首批留美学生[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3(3).
 - [3]苑书义.李鸿章科举改革思想刍议[J].近代史研究,1988(4).
 - [4]王承仁,刘铁君.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 [5]谢世诚.李鸿章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作者单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

即使放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

清代一则书院联也为今人所熟知,这便是题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据载,清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812—1817),袁明曜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楹联,袁以“惟楚有才”为上联,嘱诸生应对。贡生张中阶对以“于斯为盛”,正中下怀。此联实为集句联,上联语出《左传》原句为:“虽楚有才,晋实用之。”下联语出《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此联后来名扬天下,不仅为岳麓书院,甚至为整个湖南(楚地)作了极好的宣传,是为文化广告的又一典范。

总之,明清时期的书院楹联,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承担了文化传播功能,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广告形态。

二、官署楹联

明清两代,许多官员往往在各级官署门口贴上自撰的楹联,这类楹联由于撰写者的经历不同、抱负不同、处世态度不同、为官思想不同,其所撰联语内容也往往大异其趣,有对百姓和部属的劝诫,有对个人抱负及政治理想的抒发,有对清廉勤政的表白和自箴,也有对道德伦理的颂扬与倡导。这些对联既是官员亲撰,其立意与技巧都相对较高,作者的个性化风格也比较明显,故其艺术水平及思想境界一般都较高。当然这些楹联中也有许多宣扬封建伦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成分,其政治理想一般也没有脱离传统社会寄望于圣贤明君与清官廉吏的人治思想,甚至有一些通过宣扬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来劝诫世人的内容等等。中国古代是一个权力等差的社会,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员具有着超越普通人的巨大社会号召力,是社会舆论的中心与道德行为的楷模,其一言一行也往往对广大庶民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些人往往通过自署对联的方式将自己的思想与提倡的准则传播于庶民百姓,对联在此再次执行了文化广告的功能。

明代官员题写衙署对联较早的是明正德年间名臣王阳明,据载:“王阳明巡抚江西,置二匣于行台前,榜曰:‘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上下之情流通,奸匪皆无所容。”^[1]这里提到的“榜”本身就是古代一种社会广告载体,对联内容言简意赅,具有明显的向民众宣示的目的,并且希望得到民众的信息反馈,而最后一句也交代了此对联广告产生的有益的社会效果。

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九思任江苏句容县令,以廉俭著声,“尝图一菜于县前壁,

题曰:‘为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邑父老刻所画菜,而书‘勤’、‘俭’、‘忍’三言于上,曰‘徐公三字经’^[2]。此联主要阐明作者为官处世的原则,也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清代官员题写衙署楹联成为普遍性的行为,上至六部科院,下到省府州县,各级官署都题有楹联,其中大量是通用性官署联,这类通用联一般没有太多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也有一些官署楹联是官员特别撰写,则艺术技巧相对高超,富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如:“会稽陈公大文,总制两江时,作楹帖以颁守令曰:‘堂上一官称父母,莫道一官好做,当尽些父母恩情;阶前百姓即儿孙,休言百姓可欺,须留下儿孙地步。’言极痛切。……上元署大门联云:‘政先六十一县,非曰能之,风行二百里,固所愿也。’邑侯许维枚书二门云:‘愿皆为良善民无干刑法,誓不作贪酷吏有负平生。’陈邑侯澧书江宁署二门联云:‘未免应酬,常恐亲民时刻少,果然悦服,何妨观我国人多。’袁邑侯枚书县丞署联云:‘有一日闲且耕尔地,无十分屈莫入我门。’县丞冯光书,皆亲切可诵。光,山西人,有惠政,崇祀名宦。此联与《楹联丛话》所载黄梅县大堂联云:‘催科不免追呼,愿百姓早完国课,省事莫如忍耐,劝众人莫到公堂。’异曲同工,真仁人之言,藹如也。”^[3]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前四则楹联主要阐述官员自身的为官准则,强调自我的道德约束;后二联则侧重对百姓行为的劝勉,更加鲜明地对百姓进行政治宣传,其言辞之中明显地表达出古代基层官员对于民众勤耕与息讼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官员题写的官署楹联用语大多比较通俗浅显,用典一般也不会过于深奥难懂,而且越是基层的县署楹联用语越朴素直白。这表明官员们亦希望通过自己题写的楹联将自己的为政思想和驭民之道告知于所治理的平民百姓,希望通过楹联这一具有较高传播度的艺术形式向公众传达某种政治或文化讯息。而古代社会平民百姓的文化程度一般不会太高,这就要求官员们在题写楹联时用语要保持下里巴人的风格,而不能过于阳春白雪,否则就达不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而在实践中大部分官员也正是这么做的,这说明官员们意识到了楹联所具有的广而告之的传播功能。可以说,古代官署楹联是当时重要的文化广告。

三、其他场合的楹联

除书院楹联与官署楹联外,其他许多场

所中的楹联也切中场合、含意深刻。如古代公益机构楹联:“长乐渡生堂楹帖,录邵子诗句云:‘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在胸中。’最为浑切。又一联云:‘常使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4]此处长乐渡生堂为清代南京一处江河救生堂。“朱竹垞先生尝为施粥厂作联云:‘同是肚皮,饱者不知饥者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5]施粥厂也是古代救济贫民的公益机构。

其次如会馆楹联:清代广州城内武林会馆由杭州商贾捐金修建,既落成,其乡人梁绍壬为撰楹帖:“一阙荔支香,听玉笛吹来,遍传南海;双声杨柳曲,问金尊把处,忆否西湖。”^[6]文极清雅,对于会馆也是很好的宣传。

再如名胜古迹楹联:江苏淮阴漂母祠楹联曰:“世间多少奇男子,终古从无一妇人。”^[7]湖北黄鹤楼联:“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殊恋恋,落梅时节且登楼。”“一楼萃三楚精神,云鹤皆空残笛在;二水汇百川支派,古今无尽大江流。”^[8]皆是暗含历史典故。

再如驿站联:“贵州省某驿馆中有一联云:‘满眼尽穷黎,奚忍多用一夫,误他举家生活,两头皆险路,何不缓行几步,积君无限阴功。’仁人之言,亦积无限阴功,便是当头棒喝矣。”^[9]此联具有相当的教育意义。

在公共场所之外,官员与百姓私家宅邸所贴楹联。如:“前年过泰和,谒杨尚宝叔简,王抑庵尚书,见杨氏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门倚素王宫。’……又尝闻杨文定公(杨溥)桃符有曰:‘黎庶但教无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云。”^[10]尤其是后联,其语意透露出:古代官员将桃符(楹联)视为对黎庶进行宣传的文化工具,明代大臣杨溥就强调如果能使治下的百姓都温饱有得,又何必需要运用楹联这一形式来对百姓进行政治宣传呢?

总之,古代社会中对联作为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能达成较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可以视为古代社会最常用的“社会广告”形式之一。

参考文献

- [1]刘太品.古今行业楹联[M].中华书局,2008.
- [2]张怡.玉光剑气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甘熙.白下琐言[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 [4]梁章钜.归田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陆以滢.冷庐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7]叶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本文为广西教育厅科研立项项目,课题号:201106LX033;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课题号:XBS100012.

★作者张剑为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厦门大学博士。